

田

清

贵

州

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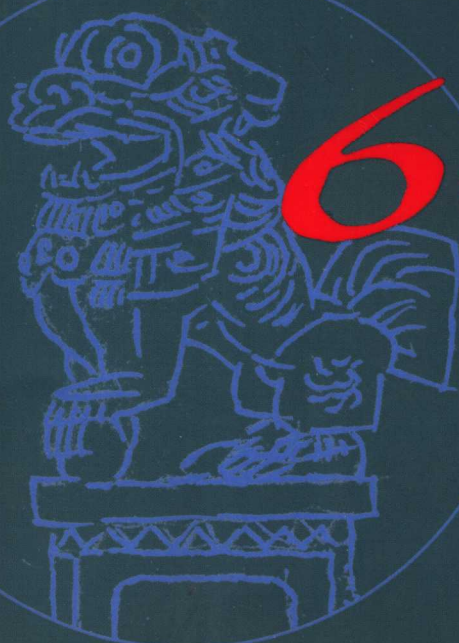
人

6000

张自信 翟翔时 曾

王青天 李世杰 刘

郑珍 莫友芝 黎



贵州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据古籍所载，明清之际，贵州文化勃兴，英才辈出，在华夏的科举场上书写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的光辉业绩。

作者本着求实存真的精神，积十年之功力，继《明清贵州七百进士》之后，又推出最新力作《明清贵州六千举人》。

本书从明清众多的举人中，精选出六十余位于国于民有重大贡献的举人，以生动的文笔，精辟的持论，翔实的史料，重现明清贵州历史文化。

本书知识性、可读性兼具，不失为了解贵州历史文化的一本好书。



王錫章



任可澄

作者简介

庞思纯，报人家庭出身，现系中学高级教师、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贵州历史学会理事、中国管理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特聘研究员。

一生喜文，笔耕不辍。近年来师从贵州著名文史学者陈福桐先生，先后在海内外发表文史论文、散文百余篇，旨在宏扬贵州历史文化，讴歌黔中先贤。2003年底出版文史专著《贵阳人文读本》，2005年春出版《明清贵州七百进士》。

责任编辑 / 王长春

封面设计、插图 / 杨笑明



明清贵州六千举人

庞思纯 著

【明清贵州六千举人】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贵州六千举人/庞斯纯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6

ISBN 7-221-07375-9

I. 明... II. 庞... III. 举人—列传—贵州省—明清时代 IV. K820.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52493号

明清贵州六千举人

- 作 者 庞思纯
编 审 陈克贤
责任编辑 王长春
装帧设计 杨笑明
插 图 杨笑明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2)
印 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20
印 张 12
印 数 0001—5000
书 号 ISBN 7-221-07375-9/K·942
定 价 34.00元

黔中人才整体大观

刘学洙

成规模地彰显一个地域人才整体状况，是了解该地域历史文化及其发展脉络的极好方法，它比分散单个地介绍人物更具全面性与科学性，也比某些见事不见人的教科书更具生动性与典型性。贵州人民出版社继推出庞思纯《明清贵州七百进士》之后，现又推出作者新著《明清贵州六千举人》，这是前书的姐妹篇，又是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普及意义的好书。

多年前，贵州文化名宿陈福桐先生曾以其《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大文，振聋发聩，一扫历来认为“贵州无人”的偏见，在省内外引起广泛反响。当时他就提议，应该编写出版一本有关贵州进士的专著，激励青年向上，爱我家乡；亦使那些对贵州历史文化知之甚少的人，有一了解贵州历史演变的读物。从那时起，这方面的述作已有不少。现在庞思纯先生不是零散的，而是整体的；不是概念的，而是有血有肉又有深度地以两部力作，荟萃贵州六百年人才全貌，填补了贵州人才史的重要方面，这是一项深化贵州省情认识的开创性工作。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云：“一人之史而可以与国史、家史相取证。”作者本着这个启示，认为研究中国边远地域，研究贵州省情，应当把“一人之史”拓展为众人之合史。乃从七百进士中，选出五十多人，又从六千举人中选出五十人，跨越明清两代，深入发掘一个个人物的家世、品格、才华、学识、独立特行之气节与事功，并将他们放在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时代背景下，联系贵州山川、人文、民族关系等深层社会环境去剖析，因此，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既写其人，又溯其源，活脱脱地托出了可触摸可感知的历史上贵州人才群像图景。这是一种严肃艰苦的工作。通观全书，搜寻觅集的文献资料特别丰富。不少史实、故事、嘉言懿行、诗文剩稿，广征博采，颇为人之未知未见。有些插曲，“穷极刻划之能事”。比如，在《父子巡抚》中，描写唐树义在湖北抗洪，当洪水涨至离坝顶仅三尺时，“一看不妙，飞身跑到坝上……独立水中，奉土负薪，身当其冲。”又写他“乘单舸，涉洪涛，核准灾民户口。”一次因总督迟迟不拨抚恤款，唐树义“按捺不住性子，气愤地说：‘尧舜在上，忍令吾民失所乎？即有严谴，请独当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作者利用史实，撷取这些精彩片断，把人物写活。在这本书中，这类人物形象与细节描写颇多。现代社科

出版物，多注重细节描述，因为惟细节才能惟妙惟肖再现历史真实。刻板无味，大言无物的读物，是不能赢得读者的。

庞氏的两本书，前一本写进士，这一本写举人。从科举功名层次看，举人逊进士一筹。而从道德文章、事功绩业看，则难分伯仲。因为，著者的取人标准重在人品、文品、官品，即贯穿人事之中的思想品格精魂。看看本书那些文化人物熠熠生辉的名字：有世誉“天末才子”的谢三秀，有孔尚任比为“屈子之闲吟泽畔，子美之放歌夔州”的吴中蕃；有士人称“金陵九子”、“崇禎八大家”之一、举家殉国的杨文骢；有“沙滩文化”领军人物、被誉为西南大儒的郑珍、莫友芝；有晚清具有世界眼光的外交家、散文家黎庶昌，他们的影响，都不是世俗功名官职所可衡量。又如明末抗清英烈、被誉为“南天一柱”的何腾蛟；清初开发台湾的周钟瑄；晚清贵州民族资产阶级精英华家三代；贵州辛亥革命元老平刚、周素园……他们的精神遗产，也超越时空，超越功名禄位。所以，本书写的是人，而蕴含的是不同时代进步精神，折射出的是贵州六百年的重要历史关节的社会面貌。由人及事，亦可作为了解黔史的一部读物视之。

像《明清贵州七百进士》、《明清贵州六千举人》这样的书，适应面应该还是比较广的。学者、官员们可以从中学悟一些知人知事、治国安民之道；一般读者也可从中学到人情世故、修身教化；以致了解仕途坎坷、宦海惊涛。可浅可深，雅俗共宜。只稍留意，就可发现这本书丰富的史料中包含多方面可以汲取与研究的内容。比如，我发现五六十位进士基本上都是明清两代部级的大员能臣，有的是中枢重臣，看出当年贵州人才群英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又如，这些进士和举人，既是黔人，而从祖先看又为客籍人。大都是从发达省区名门世家，或随军、或入官、或贬谪，先后入黔定籍的。可见，社会进步在于开放，人才的成长史亦地区的开放史。没有人才的开放、交流、互动，就不会有一个地区的迅速发展和全国的共同发展。接纳外来人才是符合本土民族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古代是这样，今天更是这样。

在当今出书难的情况下，贵州人民出版社重视贵州文化图书的编辑出版，两三年中，连续推出《进士》《举人》两书，并以重点图书问世，这是值得称道的。当今图书不但内容要吸引读者，装帧形式上也应有一定的冲击力。两部书都比较古朴大方，用纸精美，选用一些老照片的同时，配以一些插图，调剂了版面，都较符合时代出版潮流，更增加了此书的亲切感和现代感。

本书，理应敬请陈福桐前辈赐序，陈老以年迈辞谢，嘱我代劳。笔者退休闲居，师从陈老十多年，受益良多，不敢违命，因弁数言交稿，就教作者，并请陈老及读者、方家匡正。

2006年4月4日

目 录

黔中人才整体大观	3
举人秀才俊杰多	7
峭直忠耿的李时华	9
“天末才子”谢三秀	12
志在复明的郑逢元	15
以身许国的解立敬	18
魂断弘光越其杰	21
风华绝代杨文骢	26
忠烈盖世何腾蛟	30
忧患诗人吴中蕃	34
“步武先人”的潘驯父子	38
“白面龙图”刘子章	41
清初开发台湾的周钟瑄	45
瓮安才人傅玉书	49
惠泽“沙滩”的长山公	53
耿介刚直的张自信	57
经师、人师翟翔时	61
“清风惠政”曾灿奎	65
峨眉、南部“王青天”	69
文武兼资李世杰	73
“拔贡总兵”刘清	78
“黔省之英”杨芳	82
沙滩文化的领军人物——郑珍	88
黔中宿学莫友芝	96
“嵒崎豪迈”的黎庶昌	103
父子巡抚	111
高廷瑶与他的儿孙们	116
商界奇才——华氏世家	120
咸同大起义的悲剧人物——赵旭	124

大定府章氏昆仲	128
游仙诗人杨文照	132
袁师铎与修文人文	137
何威凤的丹青人生	140
循吏、才人的杨树父子	144
“陈氏三杰”之陈矩	149
“夙著清操”的丁体常	154
《续遵义府志》总纂赵恺	159
“西南之雄”雷廷珍	163
翰墨名家严寅亮	167
戊戌变法前后的乐嘉藻	171
麻哈“双璧”	175
牟琳其人其事	181
刘统之、刘显世父子	184
任可澄的人生三部曲	190
毕生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平刚	195
政坛名宿周素园	200
邓光济与岩濂妇佐的中日情缘	205
贵定名医王锡章	213
朱启钤的成功之路	217
科举知识简说	224
后记	229

贵阳三元宫

举人、秀才俊杰多

隋唐之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日趋繁荣，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科举考试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的产生，无疑对当时及后世是有着深远影响和积极意义，它不仅打破了自魏晋以来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九品中正制”，为广大贫寒士人提供入仕及参政的机会，而且提高了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和执政能力，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7世纪之后，随着海上贸易的日趋繁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亦加频繁，中国的科举、教育制度随之介绍到了欧洲，引起了许多启蒙思想家的注视，由此他们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法国，伏尔泰、孟德斯鸠、魁奈均十分推崇中国的科举制度，认为中国公开竞争的科举制堪为典范，欧洲无法相比。在德国，莱布尼兹及其弟子沃尔夫、康德、黑格尔均撰文论述过中国的科举、教育制度。在英国，不仅中国的考试制度与文官晋升制度引起思想界领袖人物的浓厚兴趣，而且流行杂志还撰文鼓吹采用中国的文官科举制。到了18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政治撰稿人认为英国应仿效中国文人晋升制和政府监察制。

尽管科举制对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及历史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赢得了西方各国的普遍赞誉，然而到了明清时期，它逐渐成为束缚士人思想、扼杀人才的一种制度。

正因为科举考试是士人谋取官禄权位的跳板，因此读书人趋之若鹜，焚膏继晷，面壁苦读，穷尽一生之精力，力闯县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道大关，最后金榜题名，荣登仕途，成为世人钦慕的天之骄子。然而科举考试犹如一座独木桥，乡试、会试和殿试的名额极其有限，全国那么多士人，有如千军万马，要想通过这座独木桥，并非轻易之事：如明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和文化的专制统治，在提倡程朱理学的同时，又实行八股文取士的制度，以八股文刻板的程式，加上以《四书》、《五经》命题的僵化内容来答题，这样的考试，造成的恶果是扼杀了读书人的个性和灵性，很难选出真才实学的人才。再则科举考试也存在着不少弊端，如行贿、夹带、枪替（雇人考试）、换卷、暗箱操作等不正之风屡禁不止，这就使很多读书人受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中举人已殊属不易，考中进士更是难于上青天。不少读书人因为无法通过这座独木桥，铩羽而归，遗憾终生。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苦读了一辈子，然而文场失意，直至七十一岁时才援例成了贡生。因此他对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的认识尤为深刻。他曾说：“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指行贿），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

填胸……”在《大江东去·寄王如水》中，蒲松龄抑止不住心中的悲愤，唱出了天下怀才不遇的士人对科场黑暗的心声：“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豪杰，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然而亦有不少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读书人，尽管命运不济，未能金榜题名，却不自悲，不气馁，在失意中奋起，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因时而变，最终成为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国运的舵手、民命的屏障和文化的传承者。如唐之李白、杜甫，宋之梅尧臣、柳永，明之吴承恩、冯梦龙、李贽，清代的蒲松龄、吴敬梓、左宗棠、黄遵宪、梁启超等。

贵州地处祖国西南地区，自古以来，文教落后。据史册记载，隋、唐、北宋时，贵州地域没有出过进士。南宋年间，播州统治者杨氏注重文教建设，建立学校，礼聘蜀中文士入播讲学，并请准朝廷每年贡士三名赴京读书应试。南宋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冉从周及第，成为播州第一位进士，亦是贵州第一位进士。明代建国以后，深谙文教功能和驭民之术的朱元璋，经过深谋远虑后，决定把教育作为基本国策，他说：“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对于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贵州，则强调：“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由于明朝历代各级地方政府贯彻执行了朱元璋的既定方针，贵州的文教得以勃兴。清朝建国后，继承发展了明代文教政策，大兴官学，作养人才，致使大批人才脱颖而出。据明清两代统计，贵州人在科举场上取得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的骄人成绩，被国人叹服为“俊杰之士，比于中州”。

近年来，由于涉猎贵州历史文化，我对明清贵州文化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七百进士六千举人”尤为关注。在恩师陈福桐先生的指导下，历时两个春秋，我终于完成了《明清贵州七百进士》一书，该书已于2005年4月出版。然而，当我静坐沉思之时，仍感到自己还有一件大事未做，还有一本《明清贵州六千举人》的专著尚未完成，对此不禁有些惶恐起来。据史册记载，贵州六千举人中，不乏英雄豪杰；在数以万计的秀才中，亦有出类拔萃之辈。他们与那些进士出身的黔中才俊相比毫不逊色，其中不少人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如明末抗清英烈被誉为“南天一柱”的何腾蛟，明末画坛“金陵九子”及诗坛“崇禎八大家”之一、举家殉难的杨文骢；有载誉文坛的“天末才子”谢三秀，其人其诗似屈原、杜甫的吴中蕃；有遵义“沙滩文化”的领军人物、被誉为“西南巨儒”的郑珍、莫友芝，著名外交家、散文家黎庶昌；有书画奇才袁师辀、何威凤，名震京华的书法家严寅亮；有贵州近代史中叱咤风云的刘显世、任可澄等，他们犹如一颗颗灿烂的星辰，与明清贵州进士中的优秀份子交相辉映，组成明清贵州文化绚丽璀璨的星河。正因为如此，我再次拿起了笔，发誓要完成”这本文史著作，以此作为《明清贵州七百进士》的姊妹篇，旨在发古人奇气幽光，以激励今人之奋斗。

峭直忠鯁的李时华

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中央政府在贵州建省。通过科举考试，一些黔中士人从而登上仕途，进入了政治舞台。这些黔山贵水孕育出来的进士、举人，以清新的风格，嵒崎磊落的襟怀，活跃在全国各地。他们抗权奸，斗宦逆，保忠臣，救良民，给丑恶黑暗的政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从而赢得了广大华夏民众的普遍赞誉。万历年间，贵阳士人李时华（字芳麓），累官监察御史，“峭直忠鯁，弹劾不避权贵”，致使“百僚震栗”，群小胆寒。其后巡按四川、河南、广东及漕运，所到之处，兴利除弊，惩治腐败，其大义凛然的形象，深得士民咸赖，天下百姓无不想望其风采。

明代是宦官最得意的时代，这些长期躲藏在宫闱的畸形人，一朝得势，便将数千年的仇恨发泄出来。他们掌控宫禁，把持朝政，入主锦衣卫，监控文武百僚，卖官鬻爵，垄断矿税，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成为社会的一大毒瘤，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其代表人物莫过于权倾一时、祸国殃民的大宦官王振、刘瑾、魏忠贤。李时华身处这样的时代，本着儒家思想的理念，出于爱国恤民的良知，斗宦逆，保忠臣，在万历王朝中树立了头角峥嵘、不畏邪恶的光辉形象。

明代中期，矿业兴起，宦官们见利润丰厚，纷纷走出紫禁城，染指各地矿业的税银，当上了税监。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御马监监丞梁永奉命前往陕西征收名马货物。按照明制，税监不准主管军队，然而梁永仗着是皇帝的亲信，私自畜马五百匹，并招致亡命之徒，命其心腹乐纲出入边塞。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富平（今甘肃庆阳西南）知县王正志向朝廷揭发梁永图谋不轨，同时参劾矿监赵钦的不法行径。为表白自己与违法宦官不共戴天，王正志逮捕了赵钦的同党李英，再将其乱棒打死。在梁永、赵钦眼中，朝廷犹如自己的天下，岂能让一位小小的县令在太岁头上动土？对比，赵钦愤恨难消，立即还击，以李英被杖杀之事攻击王正志。万历帝听信赵钦一面之词，不问青红皂白，下诏逮捕王正志。给事中（谏官）陈惟春认为这样有失公允，希望万历帝收回成命。他建议朝廷，王正志揭发赵钦的罪行，应交有司提讯；赵钦攻击王正志违法，亦下（巡）抚、（巡）按核实。这样一来，此案孰是孰非就清楚了。李时华时任御史，见忠臣被诬，大祸临头，于是又上奏万历帝，称目前已逮捕了广东新会在籍通判吴应鸿、举人劳养魁，以及云南寻甸知府蔡如川、赵州（今

河北赵县)知州甘学书等,朝廷都应下旨责令抚、按调查核实,“不得以一人单词,枉害良善。”尽管陈惟春、李时华极力为王正志辩护,但万历帝昏庸无能,一意孤行,王正志最终死在狱中。然而从这件事上可看出,李时华爱憎分明,不畏邪恶的高尚品格。

李时华与宦官的斗争并不以此为终结,然而自王正志事件后,他改变了斗争的策略,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来分化瓦解对方的阵营。在任广东巡按时,李时华得知广东税监李凤肆虐地方,民愤极大。而李凤因与新会通判吴应鸿有隙,于是上奏朝廷,将其逮捕,并将吴的赃银五千余万两及无数珍宝据为己有。珠池监李敬与李凤平素有仇,见此情况妒火中烧,于是装着廉洁奉公的面孔,处处与李凤作对。李时华十分了解李敬亦不是良善之辈,手中掌握着珍珠场税监的大权,贪婪凶横,其恶不亚于李凤,每年还从珍珠场中侵吞税银万两,以饱私囊。尽管痛恨这两个蛀虫,但见其争斗,李时华亦不放过这个绝好机会,便介入其矛盾,加入了反对李凤的阵营,据实弹劾李凤。给事中宋一韩亦向朝廷揭发了李凤侵吞赃款的罪行。吏部尚书李戴也极言李凤是造成地方祸患的首恶,为此特赴潮阳鼓噪,激起民众的怒火。粤人得知李凤的恶行时,人人争欲杀之。李时华首劾税监李凤之事,尤为时人称许。都御史温纯在朝廷素有厚望,其“肃百僚,振风纪”,清白奉公的操守,被人视为一代名臣。温纯亦十分忧患矿税为害地方,肆虐百姓,为支持李时华,特疏请罢矿税,逮捕李凤等人。其疏曰:“自矿税肆虐,未有如广东税使李凤所为者,内结粤夷,外钩红夷(葡萄牙人),图逞私胸,辄开边衅,飞而食人,甚于虎狼,岂止欺孤虐寡,积宝堆珍,如按臣李时华所陈耶。”然而万历帝昏庸糊涂,始终不愿惩办李凤。

李时华出任四川巡按时,做了一件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和地方民族团结的大事。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七月,播州(辖遵义地区)宣慰使杨应龙起兵反明,随之焚草塘、余庆,掠兴隆(黄平)、都匀,围黄平(今旧州),袭偏桥(今施秉)。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二月,贵州巡抚江东之派兵三千前去讨伐,被其诱歼,江亦因此被罢官。之后,杨应龙挥师北上,攻陷四川綦江,歼灭守军三千人,杀明将房嘉宠等。杨应龙的叛乱危及到西南地区的安定,是年十月,明神宗赐兵部右侍郎李化龙尚方宝剑,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兵马,集十四万大军,于万历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分八路围攻播州,经过四月的鏖战,杨应龙兵败身死。其后,贵州巡抚郭子章疏请将当年“播州侵水西乌江地六百里”归还平定有功的水西宣慰使安疆臣(名万铨)。然而遭到总督王象乾的反对,争议数年后,仍无结果。李时华认为不归还水西地,不仅伤害了贵州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感情,破坏了民族团结,而且埋下了动乱的祸根,不利于西南地区的长治久安,为此他上疏曰:“征播之役,水西不惟假道,又且助兵。矧(况且)失之土司,得之土司。播故输粮,水亦纳赋,不宜以土地之故,伤宇下之仁。”尚书萧大亨支持李时华

的奏疏，朝廷最终同意将原杨应龙侵占的水西地归还了安疆臣。

在四川巡按的任上，李时华还为该省及贵州人民做了两件大好事：一，四川科举弊端、漏洞甚多，难以遏制。为打击这种腐败风气，建立良好学风和规范考试纪律，他特在贡院制定条例严格施行；二，鉴于省城贵阳周边县城无县学的状况，李时华在其奏疏内款中这么写道：“一曰，议增县学。贵（阳）当开荒草创之初，经制为未备，省城贵（阳）无府，而有府自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始；附郭故无州县，而有州县自近始，规模初定，已俨然省会之具体矣。惟是新贵有县而无学，尚非全制。今播（州）事荡平，诸凡创建，焕然一新，独令首善之地（指贵阳）有此缺典，可乎？谓宜增一县学，官不必添，取诸府、司二学改授一员；廩不必设，取诸府、司二学各拔十名；庙不必建，府学与司学共，近方改于城外，则县学仍府学旧制可也。教官卫舍俱全，一转移间，而规制自大定矣。此非臣一人之私言，地方先后抚、按诸臣皆有此念，独以加廩之难，又不欲割府、司之所有，以是中擱耳。今播事已剿平，何难处此廩帑，应行抚、按酌议详细具奏，云云。”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八月，朝廷准其所请，始设新贵县学及黄平州学，改普定、平越（今福泉）为安顺、平越二府学。

李时华是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举人，工诗善文，旧学根基深厚。由于做官的原因，其一生游历甚广，足迹遍及黄河内外，大江南北。每当登临送目之时，浏览山光水色之际，其情思如涌，浮想联翩，于是摊纸挥毫，多有题咏：广州灵峰山有他的诗碑，南海神庙有他的诗刻，蜀中大地留下了他美丽的诗篇，故乡南明河畔深潭碧波是他梦魂牵系的地方。其在《涵碧潭》一诗中，怀着对故乡山水的真挚的感情，将神奇的想象、清新的语言诉之笔端，热情地讴歌了城南南明河上彩虹桥一带的美景。其诗曰：

一水绕山城，曾将洗甲兵。秋波含碧玉，春涨点红英。

龙卧归云湿，犀沉夜月明。寒潭深万丈，彻底未来清。

李时华官至太仆寺卿，后因年老体衰告归。返回故乡的李时华虽然已是平民，然而十分注意自己的操守和在民众眼中的形象，对于别人善意的批评，他虚心接受，知错必改。据《贵州通志·人物志》所载，李时华曾遇见这样一件事：往昔前辈衣锦还乡，入里门必下轿徒步，不得安车舆马炫耀乡人。时某同乡当官归里，李时华坐轿前去拜访，因而被人讥曰：“坐轿垂帘，芳麓李公声价重”，对此舆论，李时华非常不安，反躬自省后，再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从中可看出李时华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

李时华是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优秀士人，是崇山峻岭的贵州孕育的大山之子。他怀抱经国济世的理想，在宦官把持朝政、胡作非为的年代，不惜以身家性命、官阶禄位为代价，敢于与强大的宦官集团作斗争。其嫉恶如仇、不畏强权的豪情，其铮铮铁骨、凛然正气的形象，彰显了贵州士人的风骨，值得后人效法。

“天末才子”谢三秀

他来自西南边陲，来自中原士人视为“天末”的贵州。在科举上他屡试不中，极不得意，然而在翰墨场中却以卓越的诗才赢得了崇高的地位，被人誉为“天末才子”，从而使自己及故乡名显于世。清代大诗人郑珍曾有诗赞其曰：“贵州数诗家，有明推雪鸿……”意即明代贵州的诗歌大家，非他莫属。另一个大诗人莫友芝在《黔诗纪略》中亦云：“贵州自成祖开省（公元1413年）迄于神宗（万历年间），阅二百年，人才之兴媲于上国，而能专精风雅（指诗歌），隽永冲融，驰骋中原，卓然一队，虽前之文恭（孙应鳌），后有龙友（杨文骢）、滋大（吴中蕃），未有先于君采者……”郑珍和莫友芝所说的雪鸿、君采，即指的是“天末才子”——明代贵阳大诗人谢三秀。

谢三秀，字君采，贵阳人，生卒年月不详。据有限史料记载，三秀生活约在明代隆庆、万历、天启年间，即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明代封建统治走向衰弱、政治日趋腐败的年代。三秀祖籍扬州兴化，祖上随军来贵阳，担任贵州前卫官，之后定居贵阳城南南明河畔“小西湖”一带，就是今天甲秀楼浮玉桥涵碧潭附近。

古人云：“山水清幽之地，必出才华卓异之人”。事实证明，山水清绝的南明河曾经为黔中文化孕育了大批的人才，在明清的科举场上贵阳以二百二十名进士和二千名举人的骄人成绩名利黔中之首，而且孕育出明末誉为“天末才子”的诗人谢三秀和“诗书画三绝”的才子杨龙友。

昔日的南明河，清幽恬静，碧波荡漾，时而跃出水面的鱼儿，来回游弋的白鸭，岸边几个浣女、几个渔翁，给这幅画面增添了动感和情趣。两岸杨柳青青，芳草萋萋，观音阁、武侯祠“梵响磬吟，远近互答”。观音阁前转弯处，潭深水急，泠泠有声，这天籁之音正好与佛音梵乐和谐的奏鸣。当时小西湖上尚未修建甲秀楼，然而风景优美，不少旧家庭院散布其间，著名的有“石林精舍”、“江阁”、“西园”、“西崖”、“吟望亭”、“曲溪”等，常是文人雅士息息之地，文酒相娱之所。

谢三秀从小生长在南明河畔，深受山水清音的熏染，兼之自己天资聪颖，因此谢三秀对诗歌特别敏感，充满灵性，形象思维尤为突出，使他乘着想象的翅膀在诗歌的空间中自由的翱翔。当童生时，三秀卓越的诗才已被贵州提学副使吴国伦所注视。吴国伦是当时中国文坛“后七子”之一，在文人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认为谢三秀是个奇才，若学习有方，将来必有成就，因此特加指点，爱护有加。在良师的指导下，三秀诗艺精进，日趋成熟。之后吴国伦将三秀选为秀才。

谢三秀是一个追求性灵发展的读书人，对于束缚个性思想、刻板枯燥的八股文兴趣索然，因此屡试文场却名落孙山。然而三秀对科举功名看得很淡，为了扩大自己的视野，他多次离开故乡，足迹遍及吴、越、楚、闽、岭南、江右、京都，徜徉于名山大川之间，交结各省文人雅士。三秀遍交诸名士系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前后之事。万历三十三年他以贡生身份赴北京考试，是年秋天还家。五年后，三秀再次入京，有《过大梁》、《将之赤壁黄崖舟中》、《台郡登蛤蟆峰》诸诗。在三秀的诗友中，著名者莫过于李维桢、汤显祖、王稚登、何无咎等人，大家性趣相投，友谊深笃。李维桢是明代末期文坛中“末五子”之一，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诗歌理念，有复古主义倾向。他认为三秀的诗作“格整而不滞（呆板），气雄而不亢，旨深而不晦（涩），致清而不薄（浅），辞丽而不浮，诸家诗体无不精当，诗品诸妙无不具备，治世遗音也。”其对三秀如此高的评价，足可反映三秀“天才卓越”，不同反响。汤显祖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大师，代表作《牡丹亭》、《紫箫记》、《邯郸记》、《南柯记》盛行一时，享誉华夏。汤显祖生性正直，爱憎分明，因不肯趋奉权贵、敢于抨击权臣严嵩、张居正、冒犯皇帝而多次贬谪。由于亲历了官场的黑暗和不愿玷污自己的人格，汤显祖辞官还乡，潜心著述。汤显祖与谢三秀从初识至深交，主要基于以下原因：汤显祖早年在科举场上屡屡失意与谢三秀大致相同；其次他发现谢三秀才思敏捷、熟谙经史，有经国济世之才，然而怀才不遇，命乖运蹇；再则两人情趣相投，追求个性自由，蔑视功名富贵，文学观念亦十分接近。汤显祖曾赋《养龙歌送谢玄瑞（三秀）吴越游，兼呈郭开府》一诗，将三秀喻为“龙马”，“具晓经略才”，无奈“世浅”被埋没，为此希望郭开府给



予关照。这位“郭开府”即贵州巡抚郭子章。郭子章治理贵州十年，平定了播州（今遵义地区）土官杨应龙叛乱，重视贵州历史文献的保存，“尤喜奖拔士类，经其品题者，卒为佳士。”郭子章早年与谢三秀认识，出任贵州巡抚后，不以三秀科场失意而轻视他，相反对这位怀才不遇的旷世奇才十分敬重，折节下交，多方照顾。

正是由于李维桢、汤显祖等文坛名家的赞誉，以及谢三秀之后在浙江刊印的《雪鸿堂诗集》、《远条堂诗》两部诗集的相继问世，三秀之名赞声鹊起，南北诗人无不知晓贵阳诗人谢三秀。

三秀虽然早年师事“后七子”吴国伦，后又与“末七子”李维桢过从甚密，然而在诗歌创作理念和风格却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倡导复古，而三秀却直面人生，反映现实。其作品中不少反映黔中战乱给民众带来的苦难、揭露官府对少数民族的压榨，另一些诗作则描绘奇山异水、民风民俗，或思想深刻、或意象清新，给人隽永的感觉。我们先看一看其颇有杜甫忧国伤时之情的《蔺州乱后有述》，诗云：

年来戎马尚纵横，野客忧时百感生。阡外椎牛闻饷市，路旁插羽见征兵。凄风断角吹残垒，落日哀猿啸废城。满眼流亡堪涕泪，中宵引领泰阶平。

表现飘逸恬淡的思想境界，如《题画寄朱虞仲》：

百叠寒泉逗浦飞，桐花满地绿阴肥。何时小筑从君饮，共倚虚楼看翠微。又如《湘东》：

草草三湘客，遥遥万里舟。卖蓑沙上市，晒练水边楼。

远影归鸦疾，寒声过柔橹。白云与红叶，一望一层秋。

清初，大诗人朱彝尊编选《明诗综》时，唯独欣赏谢三秀，称其为“天末才子”，选录三秀十三首诗，并在其《静志居诗话》中对三秀有如下评论：“君采诗甚清稳，由其生于天末，习染全无，此黔人之轶伦超群者。”意即谢三秀的诗非常清纯而厚重，是因为他生于天末贵州，不受习俗沾染。这是黔人出类拔萃的原因之所在。莫友芝评价其诗时说：“冲和之音，恬淡之味，苍润之色初若易至，索而愈遥”；“嘴嚼六代，步骤三唐，清雄宕逸，风格隽远”。

谢三秀崛起于万山之中的贵州，来自于世人视为南荒的贵阳，虽然他仅是秀才，任过县教谕（相当于今县教育局局长），然而凭借卓越的才华，独步文坛，“与东南大家建词坛旗鼓，有正始遗音，天末才子之目”，时人赞其曰：“不骛功名，远避权势，专精风雅，著作斐然，自成一家”“为黔中冠”的大诗人。三秀的崛起，不仅否定了贵州是“蛮夷之邦”文化沙漠的谬论，而且否定了科举制度是封建士人唯一出路的偏见，从而印证了“行行出状元”的至理名言。三秀在文坛上的成功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之后的杨文骢、吴中蕃、周渔璜、郑珍、莫友芝等黔中士人，正是在三秀奋发图强的精神的启示下，冲出贵州，问鼎诗坛。正因为谢三秀在贵州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所以贵州人民至今怀念他，把他当作黔人的骄傲。